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考 古 學

人 民 出 版 社

92

2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考古學

阿爾奇浩夫斯基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考古學 (Археология)

著者：阿爾奇浩夫斯基 (А. В. Арциховский)

譯自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第二版第三卷

〔蘇聯大百科全書〕 國家科學出版局出版

考古學（Археология）是從希臘文的 *ἀρχαῖος* [古代事物的] 和 *λόγος* [科學] 來的，更準確些說，就是一種關於故實的敘述）是根據實物歷史材料來研究人類歷史上過去情況的科學。

歷史科學所支配的材料，除了文字來源外，還有實物來源。這些來源的形態各殊，就引起了由考古學專家加以研究的必要。考古學家因此經常對於古代墓地和先民居住區進行發掘。

在公元前四世紀時，柏拉圖最初使用「考古學」這個術語，他當時所指的是廣義的關於古代文物的科學。但是，「考古學」這個術語，後來仍長期有過不同的涵義，甚至至今在各國也局部地還有不同的涵義。還在十八世紀時，這個術語就已用來表示古代藝術的歷史。十九世紀時，當科學的注意力轉向古代一切遺跡（不單是藝術的）的時候，考古學才逐漸形成現代的含義；不過在某些資產階級國家內，考古學至今仍舊在研究古代世界的藝術，而藝術史因此就不得不被局限於中世紀和近代了。有時考古學被理解為藝術史的考據學，那也同樣是錯誤的。這個問題不僅是術語上的問題。這樣理解考古學不僅是縮小，而且是曲解這門科學的任務。爲着要研究遠古原始社會，許多資產階級學者就製造出一種特殊「科學」，所謂「史前史」（這個術語本身就不能成立，因爲原始社會也像古代社會、封建社會等一樣，應由歷

史學加以同等的研究）或「古代人類學」。古代的和中世紀的古物，如果它們不是藝術的，那就統統被排除於科學以外。所以，甚至考古學對象的基本定義，在資產階級的科學內都遭到一系列人為的障礙，並且至今沒有為資產階級學術界所公認。

考古學可以而且應該在同等程度上研究原始的、古代的和中世紀的一切實物的歷史材料，並且根據這些材料去恢復人類社會的歷史過去的面目。藝術史應該被認為一種特殊科學，雖然考古學家當然也時常要與藝術性的古物接觸，因為那些古物對於正確了解其他古物是必要的，或者它們本身就是羣衆性的考古材料。下列考古學的各部門是已經稍微特殊化了：銘誌學是研究刻在石頭上、金屬器具上、土器上和木器上的一切銘文的科學；古錢學是研究一切錢幣的科學；印章學是研究一切印章的科學；紋章學是研究一切徽識的科學。考古學爲着要解釋發掘所得的東西，要經常吸取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和人類學的現成資料，而它本身又對這些自然科學提供寶貴的資料，它終究還是一種歷史科學。

勞動工具、武器、裝飾品、用具以及住所、作坊、堡壘等等，都是考古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就在這個理解上，考古學在資產階級各國內也被人爲地與歷史學割離開來，因爲在那裏是把實物的古物脫離古時諸社會的社會經濟制度而加以研究的。只有在蘇聯，在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考古學家才有可能做出以物質材料爲根據的極有價值的歷史結論。

古時就已經有了考古學的萌芽。公元前六世紀時，巴比倫王拿邦尼德爲着歷史知識的興

趣曾進行若干次發掘；他特別是在建築物的奠基石上尋找過遠古時代帝王的銘誌，同時詳細地記載發掘所得或一無所得。古代羅馬偉大詩人和思想家留克利修所提供的物質文化發展譜系，是自覺研究遠古文物的結果。他在公元前一世紀時就超過了十九世紀的許多考古學家，知道石器時代是爲青銅時代取而代之，而青銅時代則爲鐵器時代取而代之，他甚至還科學地說明了這種更替次序。

在中世紀初期，一切考古學的探討都停止了。在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時代，在意大利曾進行過許多次的發掘，發掘的唯一目的就是取得古代的雕刻。

中世紀的古物在歐洲和亞洲各國首都都被收藏在政府的寶庫裏面，其中最好的就是十六世紀成立的莫斯科列姆里宮內的「武器殿」。那殿裏的成套陳列品的採集和它那些十七世紀的標目的性質，都證明在那時候的俄國已經對於古物發生興趣，首先是對於武器和對於裝飾藝術品發生興趣。當沙皇阿列克賽在位時，武器殿的領導人希特洛沃大貴族在武器殿的發展上曾起重大作用。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也再沒有這樣豐富和有體系的古物寶庫。彼得大帝對於在俄國出土的古物非常重視。他在一七一八年頒發兩個詔諭，命令收集所有被發現「在地下或水底的……古舊銘誌……古舊武器、器皿和一切極古老和不常見的東西」。他寫道：「何處有所發現，各應製出略圖，說明將要怎樣去發現出什麼東西。」對於當時歐洲科學說來，這樣的要求是新鮮的，而且無論是出土的武器，或是出土的器皿，一般地還沒有引起當時西歐學者的興趣。在十八世紀，因貴族收藏癖好的發展，有些國家的古董商們才開始收購個

別考古學上的發現。著名的法國古文字學家蒙法孔，在十八世紀初期出版了古代文物全書，對於考古採集的發展給予了巨大的影響。不久以後，在若干國家就進行了帶有科學目的的最初幾次試掘。在俄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達季塞夫從事考古學，並於一七三九年出版了世界上最早的考古發掘指南之一；其中若干論點至今沒有失去時效。十八世紀下半期，富於遠古遺物的黑海沿岸併入俄國南部版圖的時候，俄國對於古物的興趣大大發展起來。梅爾公羅夫將軍在一七六三年曾對斯基泰人巨塚進行最初幾次大規模的科學發掘，蘇馬洛考夫在十八世紀末期就開始研究克里木的古希臘諸城市。

在十八世紀末期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後，隨同資產階級歷史科學的發展，考古學也迅速開始發展起來了。在考古學的發展上，龐貝（在那不勒斯附近）的發掘會有特殊的意義。這座城在公元七九年時曾被火山的灰土所埋沒，該城的發掘開始於一七四八年，而到一七九九年，當那不勒斯被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軍隊佔領了的時候，發掘便開始具有科學性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中和拿破崙部隊中的那些活動家都對古物特別感到興趣。這種興趣，與當代典型的追求精確知識的精神相結合，就在法國佔領後的最初幾個月開始了有系統的龐貝發掘。大規模的發掘是在一七九九到一八一四年之間進行的。學者們從此才知道，一件平凡的日常用具對於歷史知識可以具有多麼大的意義。這座古羅馬城市的生活就根據這些遺蹟完全被研究出來了，而這種完善程度是從前人認為做不到的。龐貝的發掘在到處引起了對於生活日用品的古物的注意，不但對於古代的，而且對於其他各時代的這種古物也加以注意。

在十九世紀的上半期，兩河流域和埃及的古文明都被考古發掘所發現。但在這些發掘中還按照舊的傳統，把主要注意力長期地放到藝術產品和文字的歷史材料上。

古物的研究在俄國早就得到了輝煌的成就。斯登普考夫斯基在古博斯波爾王國領土內（克爾契區域），對於古希臘諸城市開始進行有系統的考古調查研究比西歐更早。當他還活著的時候，一八三〇年在克爾契附近的庫列——奧巴山開掘了一座斯基泰人的巨塚，首次把古代珠寶藝術傑作介紹給科學，以這些發掘品為代表的珠寶藝術，至今在蘇聯比在其他各國所有的都更為優秀。

斯拉夫俄羅斯考古學幾乎與古代考古學同時在俄國開始發展。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後掀起的民族熱潮，其後果之一就是加強對於古代俄羅斯歷史的新資料的尋找。起初只注意文字資料，但正是那發現了許多古代寫本的加賴多維契，發表了一八二二年在舊梁贊城所發現的金器寶藏，並相當正確地加以註釋，因而把被發掘出來的俄國古物介紹給科學；也就是他，對於俄國諸城砦（古代設防的居住區）作出第一次科學的鑑定。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霍達考夫斯基首先注意到和估量到蘇聯之特別富於城砦和巨塚。契爾特考夫在一八三八年以正確方法對於莫斯科附近斯拉夫人巨塚進行了首次的發掘。可惜，後來繼續發掘成就較少。烏瓦洛夫在一八五一年到一八五四年間對於弗拉基米爾地面的巨塚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他開掘了七千七百二十九座巨塚，但是在匆忙中所掘得的那些饒有趣味的物品甚至沒有按照葬法來區分。那些物品幾乎毫無科學價值可言，因為從七世紀一直到十四世紀的物品，已經在博物館

內無可挽回地混成一大堆了。這裏就表現出了貴族收藏的典型特徵：力圖搜羅美麗的物品，而對那些富於羣衆性而在科學上最有價值的普通資料則加以忽視。十九世紀斯拉夫俄羅斯考古學的領袖人物是出色的自學考古學家查伯林，他受到當時先進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影響，曾利用「武器殿」的精美收藏來重建古代俄羅斯生活的歷史。查伯林在世界上第一個研究出巨塚發掘的科學方法，並指明考察堆積層能得出多少重要的結論。他對於古代考古學也做了許多工作：一八六三年德涅泊河下游的斯基泰巨塚中最豐富的契爾湯姆內克的巨塚是由他發掘出來的，一八六四年在達曼的希臘巨塚中最豐富的「大雙生子」塚，也是由他發掘出來的。

在十九世紀初期各國都還認為原始社會的古物是不可辨識的，因為它們的年代劃分被認為是一件沒有希望的事。但是，當資產階級社會學家由於企圖研究人類社會的發生，而提高了對於古物的興趣的時候，那種阻礙就被克服了。現已變成科學真理的關於三個時代（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假設，在年代學上已成爲有成果的創獲性的假設。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各種不同的著作家都提出過這個假設，其中有俄國的拉吉舍夫。一八三六年丹麥考古學家湯姆生首次以考古材料把那假設奠定了。後來在與學術論敵的鬥爭中，另一丹麥考古學家瓦爾索保持了這種分類法。起初，甚至石器時代還令人懷疑。對於青銅時代的責難是特別多。直到十九世紀末期，許多考古學家還毫無根據地認為鐵也像純銅和青銅一樣古老。現在這些懷疑已爲真正學者置之不理，而三個時代的體系已爲大家所公認。

拉爾特的著作對於原始社會考古學的發展會有頗大意義。他從一八三七年起研究洞穴，曾確定那些洞穴的地質紀的年代，他第一個證明了製造最古石器的人就是與古象和其他已經絕跡的動物同時的人。只有從一八五九年（達爾文「物種起源」問世的一年）起，達爾文主義的傳播才使拉爾特的結論成爲人所公認，並爲從那時起順利發展的原始人遺蹟的勘探奠立科學基礎。法國考古學家莫爾蒂列是一個堅定的達爾文主義者，他在一八六九到一八八三年間確立了以進化論爲基礎的原始社會文物年代分類法。他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活動家，在政治上和在考古學上都是一個熱情的反對僧侶特權的人。他把對於原始人的研究與摧毀教會宇宙觀的工作加以密切聯系。石器時代的一切主要時期都是由他規定的，那些時期的名稱（色列期、亞色列期、穆斯台期等等）都是他所創立的，至今一切學者都在應用這些名稱，而不變其原義。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期間，人類學家所發現的猿與人之間相啣接的環節已成爲達爾文主義的光輝證實，因此反動的學者們曾企圖降低那些環節的意義。例如，反達爾文主義者曾經論斷，尼安德達爾人簡直就是一種病理上的變態，他並不比現代人更古老，也不能成爲現代人的祖先。假使這種爭論是純粹人類學上的爭論，大概就會延續至今。但是考古學已經確定，尼安德達爾人的葬法永遠是與那同一個考古學上的時期（穆斯台期）有關，而現代人的葬法則只與後來的各時期有關。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之間曾長期未能確定任何聯系。關於這一點學者們曾經說是「不可解的中斷」。在十九世紀末期法國考古學家皮葉特發現了一個過渡時期——中石器時代——之後，才把這個聯系確定

了。

資產階級的考古學家們很少對社會經濟關係的歷史發生興趣，他們也不從社會自身發展方面去研究社會。他們把文化的變革（特別是在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解釋爲部族的「轉移」（Миграция）或「借用」（Заимствование）的結果。在這裏我們就看到資產階級科學所有典型現象中的個別情況，就是當研究運動的時候把運動的「根源轉移到外部去」（列寧：「哲學筆記」，列寧格勒一九四七年版，第三二八頁）。

在古代社會考古學領域內，十九世紀的下半期龐貝的發掘工作又重新活躍起來（緊接着那不勒斯合併於統一的意大利之後）。直到那時爲止曾長期坐過監牢的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參加者，意大利考古學家菲奧里當時就領導了這些發掘。他以研究古代文物而致力於重建自己祖國的歷史，並以之促進民族自覺的發展。他創造了修復沒有保存或部分保存的建築或物品的一套巧妙的方法。在龐貝發掘的條件是特殊的：所清除的不是文化層，而是灰土。因此，在龐貝發現的影響下而開始其他古城的發掘時，工作方法就得重新創建。

在十九世紀時，大規模的考古探索活動就成了列強對近東進行政治侵略的手段之一，也是它們鉤心鬥角的表現之一。法、德、英、美等國派到希臘、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國的探索隊都起過這種作用。

英國考古學家愛文斯在二十世紀初期會填補了原始時代和古代文物間的一個空白。他在克里地島的發掘，發現了與埃及和亞洲有經常聯絡的青銅時代的高度文明，這個發現使考古

學家能確定克里地古物的年代。克里地器物的發現，後來在歐洲就成了歐洲考古學上年代學的最好根據。愛文斯是一個資產階級進化論的偉大代表人物，他是企圖把考古學變成歷史科學的首倡者之一，但他的歷史重建法是唯心主義的。

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瑞典考古學家蒙特留斯對於考古學有過很大影響，他是形式主義的顯赫代表，但他也是年代學上的巨匠。他按照類型來區別古物（類型，就是形式上同類物品的綜合；考古學家現在所知道的有幾萬種類型），又把那些類型編成類型進化系列，爲了這個目的就要到處仔細觀察（用精密分析細節的辦法）形式的逐漸變化。他按照發現的物品來檢查那些系列構成的正確性；例如：斧的進化、劍的進化、器皿的進化等，都依照葬地伴出物而互相參證過（早期的斧常與早期的劍一同發現，晚期的斧就常與晚期的劍一同發現等等）。這種方法的意義是被誇大了，它的主要缺陷就是只在物品自身發展中和脫離創造這些物品的社會環境去研究它們。他力圖把達爾文主義應用到考古學中去，從一種不正確的前提出發，好像物品也循着和動物的機體一樣的發展規律發展着，在這方面蒙特留斯是錯了。他確立了很多考古學上的年代（主要是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他的論據是以極端明確性著稱的；人們說他是考古學中「最大的幾何學頭腦」。蒙特留斯的繼承者是法國考古學家德色列特，他在二十世紀初期發表過一部關於西歐考古學的較好的綜合性論述著作。這部書是以法國考古學爲基礎的，它從舊石器時代開始，但特別着重於早期鐵器時代。根據無數細微發現的精密研究，古代高盧人日常生活的面貌被他重建起來了。他是第一個企圖利用蒙特

留斯的類型排列來作歷史結論的人，但他只是對部分問題做出這些結論，並沒有接觸到社會經濟的發展。

資本主義各國的殖民地擴張通常是與考古探察活動同時進行的，資產階級的考古學家會充當侵略者的同伴和助手。在十九世紀末期法國人佔領突尼斯的時候，考古學家康耶在隨軍行進時繪製出突尼斯的考古地圖（一般說來，是第一幅大型考古地圖），並在埋在砂礫裏的羅馬堡壘中發現了羅馬生活的許多新的細節。後來他把各國所有許多羅馬古代文物編成共同體系，並根據考古材料解決了羅馬生活史的一系列的問題。可是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把資產階級社會的關係搬到古代社會去了，這是資產階級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的特徵。

二十世紀的捷克考古學家尼德爾列出版了斯拉夫古物大全，他用許多論據證明了古代斯拉夫文化的共同性。

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和二十世紀初期，俄國考古學已得到了很大的成就。按考古研究的規模說，按所採用方法的準確性和新穎性說，俄國考古學家往往超過西歐考古學家。

波廖考夫是在歐洲最早研究出按照發掘到的動物區系來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的方法的學者之一。根據各種考古學的、地質學的和生物學的調查而研究新石器時代的，依諾斯特朗茨夫是歐洲第一人，他在刺多格進行了這樣的研究；由於這些發掘的結果，他第一個推翻了以爲新石器時代的特徵是磨製石器這一成見（在他所開掘的遺址中出現過磨製石器，但不是到處都出現），這成見現在誰也不同意了，但當時它是統治着歐洲學術界的。在二十世紀初期，

哥羅德佐夫首先證明在東歐有過青銅時代。著名的地理學家兼人類學家、人種學家兼考古學家安努親對於俄國考古學的發展曾有卓著成效的影響；在歐洲他第一個以考古材料成功地指出各國人民文化發展方式的一致性（在他十九世紀末期所寫的關於弓箭和葬儀用品的各種著作中）。他的著作指出大多數考古學家專事無止境地尋找「借用」之非科學性；他是不以「借用」而以共同的發展途徑來說明形式上類似的許多現象的第一人，雖然他也沒有研究過這種發展的基本法則。

在二十世紀初期會進行奧利維亞希臘城市大發掘的華爾馬考夫斯基把古代城市的研究提到了更高的水平；他那獨創的和複雜的發掘方法將一個城市在許多時代中的面貌和邊界完全調查清楚；對於古代城市這樣迅速地和確鑿地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是任何外國考古學家所做不到的。由於俄國學者們的勞績，黑海北部沿岸一般已成研究得最完善的古代地區之一。

由於一八六〇到一八八〇年戰爭的結果，原有許多古城市的中央亞細亞併入了俄羅斯帝國的版圖。這些城市從遠古時代起就是文明發源地，而在中世紀則為世界上文化最高的城市——對於考古學是極有價值的，但這些地方的發掘是複雜而困難的；多年來只得考古試掘為限。一八八五年越謝洛夫斯基在中央亞細亞曾成功地進行過試掘，那時他發現了東方希臘晚期各王國的諸城市，在這以前，還沒有人在任何地方這樣做過；中央亞細亞一帶散佈着的許多小丘（*reue*），外國旅行家都把它們當作巨塚，他正確地斷定：這些小丘是住人的，是由建築遺物隆起而成的。他同樣成功地解決了一百多年來爭論不休的關於「石雕女像」的年代問

題：他證明了這些遍佈東歐和西伯利亞一帶的雕像屬於突厥遊牧者所有。世界上最重要的古代文化中心之一——撒馬爾汗*的考古學，是二十世紀初期瓦特金用多年的勞作創立的；他比西歐考古學家更早發掘東方中世紀居住層，並研究它們的年代（他也研究過古代地層）；特別應該指出，他一九〇八年曾在撒馬爾汗附近發掘出十五世紀時兀魯伯王的天文台，這座天文台按其規模和技術的完善來說，都超過所有古代的和中世紀的天文台。馬爾曾在南高加索進行過考古工作，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曾發掘過中世紀阿爾明尼亞的首都安尼城。

斯拉夫俄羅斯巨塚的研究在十九世紀末期是特別緊張的。伊凡諾夫斯基曾把諾夫哥羅得地區五千八百七十七座巨塚加以發掘。他是第一個做到把發掘的宏大規模與發掘的系統性結合起來的，因此他的材料後來成爲俄羅斯巨塚年代學的基礎。在斯摩稜斯克附近的格涅茨多夫散佈着十世紀時俄羅斯義勇隊員的最有價值的巨塚，那些義勇隊員是古代俄羅斯封建階級的基礎。西佐夫是一個主要的研究者；他在一八八五年開掘過一座中心的豪富王侯巨塚，裏面有斯拉夫型的什物，他並且用自己的考查推翻了俄國和外國那些諾爾曼來源論者的虛構；西佐夫還能斷定那些最古的斯拉夫巨塚，即所謂長形巨塚；他是俄國考古學家裏面指出古物類型演變的年代學上的意義的第一人（以瓦蒂契人巨塚中的七瓣形鑲環爲例）；他把研究古代俄羅斯寫本中的插圖與考古學相結合。斯畢勤曾按照巨塚材料研究古代俄羅斯諸部落的分

佈；他的結論都與編年紀事中所載相符合，並且在許多地方補充了它們，這位研究者在俄國科學中佔有特殊地位；他所出版和整理分類的古物（原始的和中古的）的數量之多爲俄國考古學家裏面任何人所不及。古代俄羅斯考古研究在世界上首次指出，中古時代文物的發掘可以貢獻何等有價值的成果。

俄國革命前考古學的顯著代表大多數都屬於資產階級科學的先進代表。雖然如此，凡屬資產階級考古學所特有的那些醜惡面貌，在俄國也表現出來了。革命以前俄國科學中的那些活動家的世界觀都是唯心主義的或機械論的，實物的古物都被形式主義地加以研究，探索虛妄的「轉移」或「借用」也在俄國研究工作中佔過重大的地位。考古學家既不是也沒有認爲自己是歷史學家，他們一會兒把考古學列入自然科學，一會兒又把它列入所謂藝術科學。另一方面，革命前的歷史學家始終忽視考古學的材料；他們這種對於實物歷史材料的估計不足，其根源通常是唯心主義的方法論。在二十世紀初期，西歐的和俄國的考古學都有相同的缺陷。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俄國考古科學已循新的途徑前進。同時，西歐和美國的考古學家大多數却轉而爲反動勢力服務。西方考古學的個別成就基本上只在於積集新材料。可以使人追溯最古文明的最初發生的那些發現是極爲重要的。考古學家會長期未能弄清這個過程。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兩河流域的吾耳城發掘時，才得到解決這個問題的材料。這時所發現的最古蘇米爾人的文明被認爲世界上最古的文明。在這方面可以與它相比的是二十

世紀二十年代以前完全不爲人所知的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時候，印度河流域的那些建築完善的城市才被英國考古學家馬爾夏爾發掘出來。已經確定：像這一類最初的奴隸制社會發生在公元前四千年的時候，即在幾十萬年的原始公社制度以後。但是這些發現的真實意義，對於那些資產階級考古學家終究是不可理解的，因為他們的特性就是要在前階級社會中去尋找階級。

在二十世紀初期，在西歐研究舊石器時代的事業上，領導權已由莫爾蒂列學派進化論者方面轉移到反進化論者方面去了。法國神甫考古學家伯列伊爾就是他們的領袖；天主教會人士對這問題表現了很大積極性，因為他們分明了解人類起源問題的實際政治意義。他們善於利用莫爾蒂列的錯誤，因為莫爾蒂列對於轉變的飛躍性是估計不足的（這對於一個機械唯物主義者是典型的），而且他曾抹殺各種不同時代的燧石製造業彼此互異的情況。伯列伊爾就利用這些彼此互異情況，到處力圖詆毀進化論的原則本身，雖然他很少直接出來反對這種原則。他把石器時代支解成爲若干固定的片斷，並把它們的更替解釋爲由於一些從某處外來的新的人種和亞種的出現所致。

否認歷史過程的一致性和進步性，其終極形式就是資產階級考古學家從資產階級人種學家那裏接受過來的「文化圈理論」。在這裏一切文化現象都被固定在這些或那些圈子裏面；這種理論的擁護者計算地球上有好幾個這樣的圈子，同時把歷史過程歸結爲那些圈子領土的擴大或縮小，歸結爲個別文化因素從一個圈子侵入到另一個圈子。